

尴尬·堕落·漂泊

——新世纪小说中进城乡下女性生存境遇探析

谷显明

(湖南科技学院 中文系,湖南 永州 425100)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进城乡下女性作为叙述对象的小说构成了当代“乡下人进城”文学叙述的一大看点。这些小说集中展现了乡下女性进城后在城乡文化冲突中,陷入身份危机、身体失陷、灵魂漂泊的生存困境和心路历程,其背后承载着作者对进城乡下女性这一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关怀,隐含着作家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和探寻。

关键词:新世纪小说;乡下人进城;乡下女性;生存境遇

费孝通先生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1]但随着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本是一体的乡土社会分成了两个相对的生存空间——城市与乡村,它们“在当代文明中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极”,^[2]并以彼此截然分明的特征天然地形成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从此,中国大地上到处闪动着由乡村走向城市的身影。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农民怀着打工赚钱的梦想,涌入对于他们来说陌生而又充满希望的城市,并逐渐成为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工潮,其中就有许多“打工妹”、“打工女”。这些游走在城市边缘的乡下女性,在遭人冷漠、不被尊重、关系疏远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着,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最现实的生存图景。

文学总是以其敏锐的触角来反映社会热点问题。早在1991年便出现了反映广东地区外来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让打工妹群体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进入新世纪后,很多作家对于进城农民工这一群体给予高度的关注,出现了众多反映民工生活的小说。而在众多民工题材作品中,女性是一个不可不说的话题。如刘庆邦的《到城里去》、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张弛的《城里的月亮》、李肇正的《傻女香香》、邵丽《明惠的圣诞》、项小米的《二的》、艾伟的《小姐们》、李铁的《城市里的一棵庄稼》、盛可以的《北妹》等,这些小说都是以进城乡下女性作为主角展开叙述的,揭示了她们进驻城市后的心理冲突和生存困境,构成了当代“乡下人进城”文学叙述的一大看点。本文试图通过对新世纪反映进城乡下女性生活的民工题材小说的深度考察,探析她们游走在城市边缘的生存境遇和心路历程,以及作家在作品中所体现的价值立场和人文精神。

一 尴尬:心理失衡间身份危机

美国早期著名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镜中我”概念提出:“一个人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产生的,一个人自我的认识是关于其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映,在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之中形成自我的观念。”^[3]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农民工“双重边缘人”自我认同的形成借鉴上述理论可解释为:当农民满怀希望和追求来到城市,却从流入地居民、组织机构的态度行为中感受到了歧视、冷落和排斥,甚至始终被“打入另册”。他们既对城市充满依恋与向往,又对不能融入城市感到失落与尴尬,成为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又不能算得上真正城里人的“双重边缘人”。当前,这些进城乡下女性“常常介乎于常态与病态的模糊地带”,^[4]呈现出一种性格二重组合特征。

张弛的小说《城里的月亮》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乡下女子进城后的矛盾心理,她的内心尴尬不安正是中国农民处在世纪转型和迅速变革中陷入尴尬迷惘的一个缩影。主人公万淑红进入城市后,面对的不再是一个“熟人社会”,而是一个充满着“陌生人”的世界。她把自己看到陌生的城市与自己熟悉的乡村进行比较后,便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和感到无所适从,“觉得局促不安,手脚没地安置,眼光也好像做了贼似的躲躲闪闪”。她的这种矛盾心态,正是面对城乡贫富差距和种种不公正社会现实,产生心理失衡现象的一种反映。但从根本上说,她的这种绝望的焦躁与不安来自于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危机。

同样,这种身份危机也在李铁的《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的主人公崔喜身上反映出来。崔喜为了能过上城里人生活,费了一番心机嫁给了30多岁死了妻子的城里人宝东。当如

收稿日期:2009-03-03

基金项目:湖南科技学院资助科研项目(青年课题)“转型期以来‘乡下人进城’文学研究”(08XKYTB001)

作者简介:谷显明,男,湖南永州人,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愿地成为了一个“城里人”后,她觉得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尽快蜕去自己身上的那层乡村的皮”,于是便学着用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她的付出并没有赢得城里人的尊重,也没有换来城里人的认同,反倒引起城里人的反感。在这陌生的城市社会中,她变得越来越不适应,觉得“不像农村人了,但也不像城里人”。而李肇正笔下的香香(《傻女香香》)跟所有漂泊在城市里的乡下妹子一样,她的最高理想就是进入“城市的心脏”,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为此,她宁愿嫁一个城里的“爸爸”,也不愿意嫁给像王家海一样的乡下男人。于是,香香想方设法得到城里人刘德民的欢心,进而主动与刘德民发生了性关系。然而,当刘德民要与她去办结婚登记时,香香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命运的悲惨与凄凉。香香其实是十分向往真正的爱情的,因为她真正爱的是像刘德民儿子那样有知识有活力的城里人。可是,她只能嫁给比自己大20多岁的刘德民。最后,香香哭了。因为,当她穿上城里人的外衣时,也意味着这正是她失败的开始。

由此可见,香香也好,崔喜也罢,她们的命运是一样的。她们虽然已经走进了城市并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但在身份上既不属于乡下人,又游离于城市之外,仿佛只能像寄居蟹一样生活在城里城外的夹缝之中。因为,在城市这个概念中不包括这些来自农村的“庄稼”。

二 堕落:欲望诱惑下身体失陷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极大落差中,作为一个摆脱物质和精神贫困的人的生存本能来说,农民的逃离乡村意识成为一种幸福和荣誉的象征”^[5]。“向城求生”更成为当代中国农村的主旋律,也成为亿万中国农民在谙熟了城市与农村的强烈对比之后发自内心的对出路问题的最真切、最热烈的内心渴望。在心想逃离乡土困厄的乡下人看来,城市意象被浅表化为霓虹灯、夜总会、狐步舞、爵士乐、酒吧群、立交桥、摩天大楼、购物中心……城市标志着一种更高的物质文明,一种更高的生活层面,充满着诱人的气息和无限的欲望。然而,对于进城乡下人来说,通往城市的道路“绝不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而是一条沾满了污秽和血的崎岖小路”^[6]。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数百万来自乡村的进城打工妹,蜕变成城市里的“小姐”、“二奶”。她们只能寄生于美容院、洗头房和阴暗的出租屋里,以青春的身体换取生存的资本。因此,乡下女在城市“沦陷”也成为新世纪民工题材小说的重要选题之一。

邵丽《阴惠的圣诞》就讲述了一个名叫明惠的农村少女曾怀着美好的期待进城寻梦,最终却自杀身亡的故事。明惠为实现“要做城里人的妈”的梦想,化名为“圆圆”,以妓女的身份投入了副局长李羊群的怀抱,由妓女摇身一变成为局长夫人,并过起了悠闲奢侈、无忧无虑的城里阔少妇的生活,“睡睡觉,看看电视,有时一个人出去逛逛,有时去洗洗桑拿,做做美容”,“在李羊群家里活得像一个小主妇”。但正当明惠为梦想的实现欣喜雀跃的时候,一次意外的圣诞聚会让她的梦想灰飞烟灭。在聚会上,“圆圆”面对那些举止优雅、高

谈阔论的城市女人,感到骨子里自己作为一个乡下女人的自卑与尴尬。于是,在这个都市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时候,明惠便孤独地踏上了不归之路。另外,像崔喜(李铁《城市里的一棵庄稼》)、王家慧(《生存之民工》)、春花(《我们的路》)、小白(《保姆》)、钱小红和李思江(《北妹》)等进城乡下妹子,她们为了生存也只能像崔喜一样义无反顾地出卖自己的身体:崔喜为了获得城市户口割舍了真正爱情,嫁给了死了妻子的城里人东宝;王家慧、春花等未婚先孕,沦为弃妇而孤苦无依;李思江用少女的“初夜”与当地的村长换取一纸暂住证;保姆小白想通过与男主人公聂凯旋的性交易谋取家庭主妇的位置而遭到欺骗;钱小红明知身体交易的陷阱却又义无反顾地走进陷阱……明惠们、小白们、钱小红们等,她们在通往城市的路上,落下了辛酸的泪水,经受了无尽的磨难。

此外,诸如艾伟的《小姐们》、刘继明的《送你一束红花草》、孙惠芬的《天河洗浴》、李肇正的《傻女香香》、吴玄的《发廊》、项小米的《二的》、吴玄的《发廊》、阿宁的《米粒儿的城市》等小说,也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进城乡下女性为了圆自己的城市之梦,她们的身体一步步走向沦陷,蜕变成物欲与原欲的畸形产物。透过她们的不幸命运,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进城乡下女性在由乡入城路上落下的层层隐伤、在城市边缘地带谋生的步步艰辛、在传统与现代冲突中的万般无奈。正如柳冬妩所言,“在历史夹缝中生存的小姐,她们承担的各种压力在世界同类职业者中是少有的,身体的、经济的、人格的、心灵的。她们实际上是一个严重失语的弱势群体,在巨大的异己壁垒的压制下,出现一种很吊诡的生存状态”^[7]。从这些进城乡下女身上折射出社会变革的复杂投影。

三 漂泊:文化冲突中灵魂游荡

著名评论家张柠认为:“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或者都市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永恒时间与历史理性之间的冲突”,“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一种历史的过渡状态。这种过渡状态常常表现为一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悬空状态,它既失去了从前的幸福感,也没有对未来幸福的憧憬。^[8]进入城市的乡下女性,因自身所携带的传统乡村文化心理,他们与城市之间难以融合,也难以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当她们回到农村老家却又感到被疏远了。这决定了他们的心灵更是难以找到停泊的港湾:寄居城市,城市却容不下她们;回到乡村,乡村却又不接纳她们。“漂泊”成为他们一种难逃的宿命,也成为他们进城后的一种真实的生命图景。

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便呈现出进城乡下女性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无奈徘徊的漂泊心灵。农村姑娘李平走进城市梦想穿上新式的衣服就能将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城市人。但她的纯真没能实现她所梦寐以求的留在城市的归宿。在她看来“城里狼虎成群,你有真心,只能是喂狼喂虎……”,城市人以虚情假意,占有她的肉体,掠取她的真情。她最终只有选择回归乡土,将希望寄托在农村,以重新获得情感的皈依。但回归的她却再也找不到那份曾经属于自己的安宁,而是整日沉浸在过去噩梦般的恐惧之中。像吴玄的小说《发廊》里的主人公方圆,也同样经历着这种漂泊游荡的

命运遭遇。她在自己的恋人李培林意外死亡后,决定返回故乡的怀抱里寻到一点安慰。但是,回到故乡的方圆并没有找到灵魂的栖息地,“西地在她的心里已经很陌生”,觉得自己已不再属于那个养育了自己的故乡,甚至连自己的生理也已经城市化,“她还延续着城里的生活,白天睡觉,夜里劳作,可是在西地,夜里根本就没事可作,更可怕的是,每到夜里二点,她的乳房就有一种感觉,好像李培林的灵魂也跟到了西地,照常在这个时候吸奶。回家的第三天,方圆到山下的镇里买了一台VCD机,发疯似的购买了二百多盘碟片,然后躺在家里看碟片。也许扭曲的灵魂必须到扭曲的空间才能得到安宁,方圆结束一个月的返乡旅途之后,再次踏上了去开发廊之路。逃离乡村——寄居城市——回归乡村,正是进城乡下女性曾经或正在经历着的生活模式。

另外,在《北妹》、《小姐们》、《小姐回家》等小说中,回归故土便成了众多进城乡下女性最为现实的一种选择。然而,“事实上,当乡村一开始遭遇都市现代性的时候,乡村乌托邦在顷刻间就坍塌了。那个我们想象质朴、清纯、宁静的乡村世外桃源,迅速地走向了滚滚红尘。”^[9]乡村传统意义上的伦理道德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下已经分崩离析,乡土也不再是安息进城返乡者漂泊灵魂的一方精神乐土。返乡后的阿莲在村支书等基层官僚的排挤打压下,不得不隐姓埋名流落他乡;刘素兰的酒店因被迫关门,只能再次离乡进城;“面对被工业社会 and 城市化进程所遗弃的乡间景色,我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回到故乡,但注定又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匆匆离开。对很多人来说,‘乡村’这个词已经死亡。不管是发达地区的‘城中村’,还是内陆的‘空心村’,它们都失去了乡村的灵魂和财宝,内容和形式。一无所有,赤裸在大地上。”^[10]那么,她们的未来究竟属于城市,还是属于乡村?她们的路又在何方?她们的根又在哪里?这是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叙事提出的一个沉重而现实的现代性命题。

通过对文本考察,我们发现这些作品体现出作家对进城乡下女性这个特殊群体生存状态的焦虑和命运遭际的关怀。从反映的生存图景来看,发廊里的“外来妹”生活、主人家的“小保姆”生活、酒店里的“三陪女”生活,甚至垃圾场的“破烂人”生活,全都出现在乡下女性进城的作品中,可见其反映

视角的广度和反映问题的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其背后承载着作者对进城乡下女性这一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关怀,隐含着作家对中国现代化的反思和探寻。也许,进城打工妹的生活,远比这些小说更丰富、更深刻。这些进城乡下女性中也不乏自立自强的奋斗者,她们在城市底层艰难地抗争着,展现了新一代女性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和昂扬奋进的坚实脚步。这些期待作家们以敏锐的观察力与朴素的关怀精神,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真实的现实生活,写出我们这个变迁时代的民族心灵史。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9.
- [2] [美] 帕克. 城市社会学 [M]. 宋俊岭,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 275.
- [3] 戴维·波普诺. 社会学:第10版 [M]. 李强,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148.
- [4] 刘再复. 性格组合论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184.
- [5] 丁帆. 中国乡土小说史论 [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 30.
- [6] 丁帆. “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 [J]. 文学评论, 2005(4).
- [7] 柳冬妩. 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 [M].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6: 33.
- [8] 张柠. 文化的病症:中国当代经验研究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4 - 8.
- [9] 子水. 《北妹》:底层女性生死书 [EB/OL]. [2004 - 06 - 15]. <http://www.people.com.cn/GB/14738/14754/21861/2571783.html>
- [10] 柳冬妩. 城中村: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 [J]. 读书, 2005(2).

(责任编辑:黄声波)